

十

愤怒的反抗者

抗日战争图书馆藏书
www.krzzjn.com

抗日战争图书馆藏书
www.krzzjn.com

浩良河制材工人 同日伪斗争的几个片断

姚发 苏毅 宇寒

浩良河木材加工厂，坐落在小兴安岭南麓，汤旺河北岸，是个以木材加工为主的综合性林产工业。现有职工、青年两千多人，每年给国家上缴利润将近300万元。它的前身是浩良河火锯厂，建于1939年秋，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大量掠夺中国的木材，加紧侵略战争，由日本合同株式会社在浩良河筹建的。建厂初期，有三百来人，大部分是丹东（安东）一个火锯厂迁来的，一部分则是从山东等地招募来的。经营这个厂的主要是日本人，还有一些中国的二把头。日伪用刺刀和皮鞭强迫中国工人劳动，每天劳动达12小时，微薄的工资经过层层克扣也所剩无几了。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制材工人，对日伪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斗争，下面记叙的仅是几个片断。

团结一心 鬼子丧胆

1944年6月的一天，午前下了一场大雨，午后才开始放晴。按照鬼子的规律，雨天没法干活可以歇着，天晴就得干。已经到了上班的时间，工人们看到外边虽然雨停了，但到处还是湿漉漉的，所以工人们没听那个邪，虽说到了上班的点，工友们谁也没动。有的在玩牌，有的在旁边捧场看热闹，还有的在一旁闲聊。锯木车间有一个名叫成田，外号“三滨”的鬼子，为人心黑手狠，一看天也放晴了，上班时间也到了，可就是没人

来上班。于是气冲冲地到工棚子来找工人们算帐。

工人们住的工棚子紧连着厨房，穿过厨房才能看到工棚子。“三滨”进了厨房，探头往工棚子里一瞧，呵！玩纸牌的玩纸牌，看热闹的看热闹，没有一个要上工的样子，可把这个鬼子气坏了。他看到面案上有把大茶壶，顺手就操过来，嘴里骂着“八格牙路”，手里就将大壶抛了过去。还好，这壶没砸着人，却砸到了屋子中间木柱子上，茶壶在柱子上开了花，碎磁片四下飞溅，有一片进到了一个外名叫“刘铁嘴”的工友的脸上，脸被划开一个大口子。这下可把大伙惹火了，平时大家就对这个“三滨”鬼子恨之入骨，今天又看到他这样逞凶，个个都气愤万分，这时有个叫秦士德的工友，年纪大约三十五六岁，浓眉大眼，是个血气方刚爱打抱不平的人。他看到这情景，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怒火，嘴里喊了一声“打他个狗日的”就头一个冲了上去，大伙也像火山爆发一样，呼喊声向外涌去，“三滨”也发毛了，于是撒鸭子向帐房跑，工友们在后面呼喊追。

当“三滨”狼狈不堪地跑到帐房，就一口气扎到帐房后面的屋子里，再也不敢露面了。人们把帐房围了个水泄不通。由秦士德出面，向鬼子的大柜要人。鬼子大柜不甘心把“三滨”交出来，但又没有办法说服工人回去上班，正在为难之际，有个关东军驻浩良河的鬼子军官来找大柜办事，鬼子大柜一看来了救星，就让关东军出面威胁群众。6月天气，虽说刚下过雨，但天还是比较热的，这个日本关东军下身穿着皮鞋、皮裤、头戴战斗帽，上身穿着白衬衫，腰上带一把很长的战刀。这家伙面目狰狞，嘴上留撇“仁丹”胡，气势汹汹地来到众人面前，刷地拔出洋刀晃了几晃，又做了个砍人的架式，但看到黑鸦鸦的人群，又有些胆虚。秦士德根本没有把这个小子放在眼里，仍旧站在队伍的前头，双手叉着腰，一个劲地叫“三滨”滚出来。

关东军这个头目也看出秦士德是个头，就几步蹿到秦士德的面前，用凶神般的眼睛瞪着秦士德，秦士德也用充满仇恨怒火、蔑视的眼光瞅着关东军鬼子。他心里想，如果你敢动手，工友们就会把你打成肉酱，还会把这罪恶的帐房一扫光。一个鬼子、一群工人眼对眼地僵视了几分钟，谁也不肯示弱，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帐房里又出来一个二先生，是个中国人，专门替鬼子管个帐、跑个腿，只见他来到鬼子军官面前，对鬼子叽哩哇拉地不知说了些什么之后，那个鬼子军官才气呼呼地收了刀，又狠狠地瞅了秦士德一眼，回到帐房里去了。帐房的二先生又向工人们解释、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情，工人们才算罢休。这场斗争工友们取得了胜利。

鬼子也怕中国工人

日本鬼子要求工人加工过的两块板，合在一块没有缝隙才算合乎规格，不然的话，轻则挨顿臭骂，重则扣发工资，挨顿皮鞭。1944年的一天，锯木工友老张和他的下手正在干活，鬼子“三滨”转悠到他们锯机前，拿起两块板一对，中间有一段有缝，“三滨”就火了，满嘴“八格牙路”骂个不绝，还操起一块板要打这两个工友，工友老张心想平日挨打受骂，今天拚我这条老命，也要给鬼子点颜色看看。他见鬼子没怎么提防，就假装找什么东西似地凑到鬼子跟前，对准“三滨”的脸，狠狠地打了他两个耳光，把“三滨”的眼镜打飞了，嘴角也淌血了。他一面哇哩哇啦地乱叫，一面在地下摸眼镜。老张又顺手摸起个锯比子朝“三滨”头上砸去，“三滨”一看不妙，吓得眼镜也顾不得找了，屁滚尿流地往回跑，一口气跑到了家，随即把大门顶上，还在里面上锁。工友老张在后面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三滨”的老窝，一看“三滨”把门顶上了，就在外面用棒

子敲，喊着“三滨”的名字叫他滚出来，“三滨”说什么也不敢出来，老张看这个鬼子实在“草鸡”了，才算罢休。“三滨”吓得三天三夜没敢出门，连大小便都不出院子。后来帐房大柜知道了这件事，把“三滨”叫去了，把他“草鸡”“脓包”地臭骂一顿，说他连中国工人都制不了，给帝国丢脸。这小子成了笼里的包子，左右受气。以后“三滨”也学乖了，再见到工友老张总是客客气气的，从此大家更看清了日本侵略者外强中干的虚弱本性。

以计取胜 痛打把头

日本鬼子为了更有效、更残酷地剥削压榨中国工人，往往采取以华治华的政策。在浩良河火锯厂，他们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花钱雇佣了一批帮凶，充当他们的走狗，为他们效劳，监视工人，工友们把这些家伙叫“二把头”。他们了解工友情况，花花点子也多，有的比鬼子还坏上几分。他们为了讨主人的好，什么下贱、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为的是从中揩到一点油水，得到一点实惠。工友们都恨透了这些“二把头”。

有个姜把头，他很坏，在二把头当中是数一数二的。他专门负责给工人发放衣服、配给粮票等。在分发的过程中，他每次都从中渔利。不管分给工人什么东西，他都要从中揩一点油，如分发给粮票，本来鬼子给的就够少了，可是他还要从中扣一些，说是上面没给那么多，工人吃不饱，只好饿着肚子上班，就是发放给工人的鞋袜，他也要勒下来一部分，然后再转卖给工人，工友们看他拿着骗取来的钱花天酒地地挥霍，都气得鼓鼓的，背地里都说，得好好教训他一顿。

一天，以小王为首的五六个工友商量了一条收拾二把头的计策。原来，小王他们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发现姜把头经常到

镇里去逛妓院，每次回家总得十一二点钟，而且常走偏僻小巷。于是，几个工人商量决定，由小王在前，拿两包石灰，准备给姜把头受用，让他看不清是谁，后面几个大棒子就给他抡上。赶上个阴天没月亮的日子，小王等几个人看看巡逻的警察都没动静了，就悄悄地来到姜把头回家的必经小巷埋伏起来。过了一会儿，姜把头喝得醉醺醺的，哼着下流小曲，一晃三摇地踱了过来。小王看他来到了跟前，猛地从黑暗中跑了出来，将两大把石灰往姜把头眼睛上泼了过去，只杀得这小子双手捂着眼睛爹呀娘呀地乱叫。其他几个工友冲了上来，大棒子抡开了一顿痛打，姜把头跪地求饶，尽说拜年话，工友们直打得他连告饶话也说不出来，一声口哨才兴高采烈地散了。

这一顿大棒把姜把头打得昏厥过去，直到第二天清晨被巡逻的警察发现，才连拖带拽地把他弄回家，好长时间也上不了班，工人个个拍手称快，把头们为虎作伥的气焰受到震慑。

智斗鬼子 消极怠工

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中国的财富，加紧战争，采用高压政策加紧掠夺木材。工友们眼睁睁地看着祖国的大森林被一片片地毁掉，白花花的板方材被一车车地装走，哪有不心疼、不心焦的。来硬的，和敌人明着干，敌人有枪有炮，我们赤手空拳显然不行，只能来暗的，工友们仔细观察，长期琢磨，终于想出对付敌人的巧妙的办法。原来他们发现鬼子有个规律，只要听到机器在运转，就心安理得，不往跟前转了，如果发现工友聚堆聊天，轻了一顿皮鞭，重则丢了饭碗。根据鬼子割的木材没数、不检尺，来车就装走。工人们针对这些情况，想出了消极怠工的办法，那就是一道锯上所有的人都不干活，而把锯机开着，叫它轰隆隆地空响，把一块待加工的木头摆好，周围再

放好一堆加工完的成材，在隐蔽的高处安排一个放哨的工友，等到鬼子一露头，一声暗号，大家都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割锯的割锯，上料的上料，鬼子走到跟前，有时还笑咪咪地说声“约西”（好）。

但也有意外的时候，有一天，大家装模作样地刚把鬼子骗走，就都放下手中的活计，闲聊起来，谁知，这个鬼子走得不太远，听出锯机响的不是动静，又悄悄地转回来，看见工友们没干活，就大声咆哮起来，向工人堆里抡起了皮鞭，其中有个工人急中生智，在地上拣起一块碎锯片，把自己手划了一个大口子，说是手被锯机碰坏了，大家帮他包扎，才算混了过去。

一人有难 大家帮忙

日本侵略者越是接近灭亡，对中国的掠夺越是加强，对中国人的监视防范也就越严，兽性发作的次数也越多。一次，工人小李新安家，住一小间一阵大风就能吹倒的破马架子，屋里又小又黑，连个做饭的地方都挤不出来，没办法，小李准备在外边搭个锅灶，可又没处弄材料。他发现厂子锅炉旁边有一堆碎砖头，就趁下班后的时间拣了两筐，刚挑起来没走上几步，不想被板院的鬼子高桥发现了。鬼子一边大骂一边追了上来，小李一看情况不好，把筐扔下就跑，终于被鬼子撵上了，高桥冲上来左右开弓就是两个大嘴巴，把小李打倒后，又用皮鞋在小李身上乱踢。

这件事被一个工友发现了，他赶紧跑回工棚，大喊：鬼子又打人啦！工友们闻讯全体出动，鬼子接受了“三鞭”挨打的教训，赶快夹着尾巴跑回大柜去了。

又一次，一个姓孙的工友在锯木干活，由于鬼子根本不设什么防护措施，推料时衣服袖子被伸出来的树丫挂住，发现时

已经晚了，胳膊被带进了圆锯，鲜血把整个飞转的圆锯染红了，人也昏倒在锯机旁。

大家看到这种情况，谁也没心干活了，几个工友撕破了自己的衣襟给老孙的胳膊草草地包扎一下，又找来水，把血冲一冲，然后大家就抬着他齐聚到帐房前，要求给受伤的工友治疗。开始，鬼子的态度非常强硬，说是碰伤的活该，并强迫工人回去干活，还用开除出厂来威胁。工友们更加火了，大家异口同声表示，如果老孙的伤得不到治疗，谁也不到锯机上干活。大柜头名叫“卡拉子”的鬼子一看工友们团结一心，态度坚决，僵下去生产要受损失，才把态度缓和下来，答应要设安全罩，工友们才陆续地回去上班。通过这件事，大家都感到：只有抱成一个团，才有穷人的活路。

保护工厂 迎接黎明

1945年8月，刚一解放，正是“乱扒地”时期，鬼子刚滚蛋，党还没派人来接收，工厂处于停滞状态，四处啥人都有，一些人总惦着工厂是块肉，合计着要逗点“洋捞”。全厂二百来人，把头溜了，工人中有的回原籍，有的跑“老客”，附近村屯也有一部分人要到厂子砸仓库，割皮带，拿锯条，国民党操纵的大同盟，甚至策划要烧掉厂子。山雨欲来，工人屹立。这时候，工友们凑在一起反复合计，鬼子跑了，工厂总算是中国人的了，亡国奴当到头了，如果没有了工厂，工人也就丢掉了饭碗，有几个年纪比较大的带头，像陈恒发、张文富、潘显贵、高久方等十几个人，自发地组织起来自愿护厂。他们用五分铁棍在洪炉捻个尖当护厂武器，昼夜巡护火锯厂。

开头，大家都在一块看着，后来每班两个人，几小时一轮班，不管风暴雨雪，工友们肩扛扎枪，手提马灯进行护厂巡逻。

当时在工厂停产，工人停工，吃了上顿没下顿，地痞流氓蜂起，四外有土匪经常到村屯抢掠，道北又有反动的大同盟嚣张活动的情况下护厂队表现了工人阶级的战斗本色。

一次，汤旺河南木良屯来伙人到厂子割皮带，护厂人员劝阻不听，最后全体工人出动把这些人轰走了。但这些人不甘心，又和吉兴屯一些人串通，找到了反动的大同盟，护厂队张文富一次上街，被这些人辱骂，双方动了手，大同盟把张文富抓了起来，声言要枪毙他，最后全体护厂队员齐聚大同盟门前把老张要出来了。

又一次，护厂队员陈恒发夜间巡逻发现锯机下的地下室有一堆沾满机油的锯末子，情知有人破坏要烧掉工厂，及时地加以清除并加强了巡护，终于保住了工厂。直到1947年党派黄学经同志带队伍进驻浩良河，人民的工厂终于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政协南岔区委员会供稿)

李玉成锹劈三害

刘翰章

日伪统治时期，各县公署每年两次在农村强征劳工，每期6个月，挨家轮换。李玉成是辽宁省安东县小椅子圈村农民，1940年6月被征。当时，在他家乡共征500名劳工，一起发到黑龙江省虎林县水克站（今半站），修水克——虎头的公路干线。这条公路要通过一望无际的沼泽地，工程很艰苦。

包工单位是日本招工大柜荒川组，驻虎头，离水克30公里。

水克工地由劳工大队长于文龙负责，于手下有一个中队长，一名管帐先生。这些人对劳工很苛毒。劳工一到工地被赶进涝洼塘，每天从清晨起，站在水里，挖草垫子垫路基，铺砂石，直到黄昏。可是，还要从他们身上揩油。

刚来的几天，伙食还可以，能吃上白面，还有人按时往工地送热水。可是，到了第五天头上，伙食就变样了，吃橡子面、豆饼、红高粱米，也没人往工地送水了。人们干不到晌午，肚子就咕咕地叫起来。李玉成连渴带饿，好容易挨到中午收工，一气跑到伙房，想弄点吃的。一进伙房就问大师傅：“怎么今天没送水！”大师傅没好气地回答：“还送水呢！你看一看锅里做的什么饭！”李玉成打开锅盖，一看还是橡子面，就到缸里拿瓢舀凉水喝，水也有股怪味。大师傅告诉李玉成，白面叫大队长、中队长、管帐先生给卖了，又买了橡子面，而剩下的钱都装进他们的腰包里去了。这时，劳工们都陆陆续续来到伙房等吃午饭。李玉成当时二十来岁，脾气暴，胆子大，当众就大骂：“粮食都叫这帮小子给卖钱花了，纯粹是坑人！”哪知大队长于文龙就在他的身后，听得清清楚楚，顿时恼羞成怒，抄起洋镐把照李的身后抡来，李玉成一个踉跄，就势抓起一把铁锹，回身来愤怒地喊：“妈啊！你还动手了！”一锹将于文龙劈倒在地，又连劈几锹，把这个大队长当场劈死了。接着又拿锹去找中队长和管帐先生，发现他们已经溜了。过一个小时，虎头荒川大柜一个带战刀的日本和一名翻译，骑马赶到工棚，下马直奔于文龙的尸体，边看边问：“是谁打死的？”李玉成说：“是我打死的。”“为什么打死他？”“他把白面给卖了，给我们橡子面吃，饿得抗不了，我说了说就用镐把打我。”翻译问：“怎么不向大柜告他？”李说：“我们是刚从水克下车的，谁知道大柜在什么地方。”那个日本人瞪起蛤蟆眼，照李玉成就是一脚，骂声“八嘎”。李玉

成一一看那势头，没等鬼子扬战刀，就搂头一锹又将这个日本鬼子劈死了。翻译惊呆了，结结巴巴地责怪李说：“你把他劈死了，我，我回去怎么交待？”李玉成听了气愤地指责他，问：“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再不敢吱声了，上马要回虎头去报告。尽管李一再劝阻，可是，这个翻译只知道有日本主子，听不进去。李一想，反正是一不做二不休，上去就把他从马背上拖下来，一锹把这个翻译也给劈死了。

李玉成一连劈死三个坏蛋，自知惹下大祸，如今之计，走为上策。他问大家：“你们走不走？我可要走了。”他进了工棚，把被褥中的棉花扒出来，把里和面捆成一个小行李卷，背在身上顺大道向西逃去。跑到半拉锅（今庆丰），天已黑下来了。他找到一个地窖子，上前叩门。一个手拿木棍的老人开门问：“干什么来了？”李说：“找宿。”老人听李是安东一带的口音，亲切地说：“老疙瘩，请进来吧。”原来里面住着两位老人，是同乡，李就向他们讲了自己的来历。他们听了，“啊！你杀了他们，日本鬼子不会轻饶你，一来搜查，你在这站不住脚。这样吧，今天在这睡一宿，明天我俩送你上路。”当李睡下后，两位老人就动手给他烙路上带的干粮。第二天，两位老人亲自送李上路。他们三人顺铁道线向西走。老人边走边向李玉成叮嘱：“咱们这一路要经过两个日本兵营和一个飞机场。如果遇到有人盘问，你不要答话，由我们俩来对付他们。”一路还算顺利，没有遇到盘问的人。到了宝东车站，两位老人停下来了，又嘱咐李：“一定顺铁道线往西走，过了东安（今密山）站，再过三个小站，就可以买票上车了。如果遇上搬道的铁路工人，你就躲在道旁的草棵里，等他们过去再走。晚间他们手里拿着路灯，你老远就能发现。”两位老人殷切的关照，使李玉成十分感激，他对两位老人说：“老人家，你们的恩情，我一辈子了忘不了，咱们后会

有期！”

李玉成到了连珠山车站，但由于没有证明书，买不上车票。正在为难，遇到一位老者，带六七口人搬家去三棵树。于是，他就恳求这位老年人，谎说证明书丢了。这位好心的老者，让孩子给他买了张三棵树的票，并告诫他说：“车上也有查证明书的，过了林口才没人查。上车后，我们一家坐在一块，你就在我们座位底下躺着，等到了林口，再把你叫起来，再就不怕了。”就这样，李玉成登上车后，就躺在座位底下，一路憋闷，好容易熬到林口，才爬出来坐到座位上。到了三棵树，他又托人买了张去安东的票，回到了家乡。

他到家不久，村公所就来人了，问他：“你怎么回来了？你的通缉令都来了，这里千万不能再呆了，快搬家吧。”李听后，急忙将家搬到距椅子圈村60公里的新沟沿村。住不多日子小椅子圈村又来人送信，告诉他，这里也不能呆下去了，还得躲。李只好抛家舍业乘船过海，来到山东省乳山县丈八石村老家。

在老家，他于1941年1月，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北海独立35团三营八连当战士，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又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晋升为连长。1962年复员，1972年全家搬到虎林。

（摘自《虎林文史资料》）

牛庄街头出现的反伪官吏藏头诗

李国安

1942年，日本侵略者豢养下的伪牛庄街公所，官吏横行，抓

工逼税，勒索民财，无恶不作，引起了牛庄人民的极大愤恨。9月，副街长梁树先因效劳日寇有功，被提拔升迁。调走前，地主豪绅纷纷宴请，为其祝贺。有一天，梁树先去程记饭庄赴宴，走到南北大街，忽然看见西门脸外围着很多人，正看着什么呢。他和随从人员走到近前，见墙上贴着一张“黑贴子”（即大字报），白纸黑字写着一首诗：

牛小心脏坏事梁，
装模作样李树堂。
衙款侵吞启会计，
公务玩弄病在杨。
所发配给齐克扣，
职务错乱蔡贪郎。
员索民众张鹿孔，
弊挑劳工不改常。

这首诗竖念第一行是：“牛庄衙公所职员弊”，横念每句都指出一个衙公所官吏的坏事。如“心脏坏事”的副街长梁树先，装模作样的街长李树堂，侵吞衙款的姓齐的，姓启的，玩忽职守，勒索百姓的姓杨的、姓蔡的、姓张的、姓鹿的、姓孔的，专门抓劳工的常铨等。看的人越聚越多，有的人情不自禁地大声念起来。诗中写出了百姓的心声，人人拍手称快。

梁树先又羞又恼，急忙回到衙公所，派了很多人到处抓写诗的人，抓了好几天也没抓到。后来，在“同兴福”鞋铺发现了这首诗的草稿，经过追查，查出是牛庄城中医郑雅桥和石子云等共四人所写，立即把他们抓到衙公所关了起来。郑雅桥等四人受尽严刑拷打，他们虽承认自己写了诗，但不承认是诬陷官员，所写的都是真事。这就更加惹恼了衙公所的官吏，把他们关押在牢内不放。

在押期间，有一名看守，名叫温亚宣，心里很同情郑雅桥四人，觉得他们写得对、说得好，替老百姓出了气。温亚宣偷偷送给郑雅桥一份纸笔，让他写呈子（讼状）上告。郑雅桥就把他们所见的街公官吏勒索民财、胡作非为的一些事都写在呈子上。温亚宣藏起呈子，悄悄地替他们捎出去，投寄新京（长春）监察机关。

后来，新京来了一名警官，审讯此案，郑雅桥四人把街公所的丑事全盘说出，百姓们也到街公所要求释放被抓的四个人。警官无奈，只得宣判四人无罪，释放回家。其时，这四个人已经被关押了两个月零八天。

以后，这首揭露伪官吏的藏头诗就在牛庄流传开了，到现在人们还经常谈论这个事。

（摘自《海城文史资料》）

爱国老人王明选刻石铭心

杨文兴

在萝北县最北部边境，有个依山傍水的古老山村——太平沟。村子东面，黑龙江边有一片突兀的石丛。人们临近这片石丛，一眼便可看到一块约有3立方米大的马鞍形巨石。就在这块巨石的东侧光滑的倾斜面上，工工整整地凿刻着14个醒目大字：“此石可烂，倭匪之仇不可忘。九·一八。”

每逢汛期，江水上涨，这块巨石被淹没在黑龙江的滚滚怒涛之中。一到枯水期，它又全部裸露出来，以刻石者面对日军入侵时的满腔怒火，给人以崇高的爱国主义的昭示。寒来暑往，

年复一年，几十个年头过去了，它经受了多少次风吹雨淋、江水冲刷和冰排撞击，却丝毫没有改变它的容颜，字迹依然那样醒目！人们看见这坚硬的巨石，感受着坚贞的情怀，自然会想到当年刻石者怒不可遏的神态和集仇恨于凿锤的气魄。

这刻石者究竟是谁？笔者有幸，查知他是当地知名爱国人士王明选老先生。

王明选老先生原是山东掖县朱桥人，14岁去苏联，1928年回国，定居太平沟。老先生知识渊博，精通俄文，懂得西医。在那个军阀统治、土匪横行、外寇压境、民生凋敝的年月里，老先生宁愿在小山村里办点实业。他从苏联引进一批蜜蜂，首创了萝北县的养蜂业。养蜂之余，还经常为当地群众看病、治病，向来是分文不收。因此，他深受当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继续向北进犯。王明选老先生经常徘徊在江畔，抚摸着江岸上的每一棵树和江边上巨石。了解他的人，只知他心中充满着深沉的忧伤和无比的愤怒，却不知他要做些什么。

在一个月明如洗的夜晚，老先生手拿铁锤和钢凿，悄悄来到江边。在他早已选中的那块巨石的倾斜面跟前，停下脚步，伏下身子，挥动铁锤，一笔一划地用力凿刻。石面是那样的坚硬，每刻一个字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一锤接一锤，一笔又一笔，老先生的手磨起了血泡，震出血来，但他还是拚力地凿刻。也不知凿了多长时间，终于在光滑的石面上刻下那14个不可磨灭的大字。这个事实，在当时是不允许泄漏的，别人只能在第二天以后发现巨石上有了14个拳头大的刻字。

1936年，日军进占太平沟后，苏联红军经常偷袭日军的边防哨卡。日军认定太平沟有通苏的抗日分子，王明选老先生成了他们的重点监视对象。次年，老先生悄悄离开太平沟，改名

换姓，隐居在哈尔滨市郊嫩汉屯。

日军得知王明选老先生失踪的消息，立即撤下特务，四处打探。当特务摸到哈尔滨郊区时，老先生又巧妙地转移了。他在朋友的掩护下，佯装精神病患者，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日军还是不肯罢休，特务又追踪到协和医院。可是，负责为老先生进行治疗的日本医生确诊他是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这时，半信半疑的特务化装成病人，坚持和老先生纠缠，老先生以他高度的警惕性和渊博的医学知识，最后骗过了特务的眼睛，终于化险为夷。直到1945年光复他才出院，回到太平沟。

老先生回到太平沟后，修复了蜂场，发展了养蜂业。公私合营时，他将价值万余元的蜂场归了集体。

1957年，年近八旬的王老先生离开太平沟，去哈尔滨投奔儿子王双。1960年，老先生于哈尔滨逝世。刻石者长逝了，而代表着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刻字巨石，永远屹立在黑龙江畔！

（萝北县政协供稿）

“相扑大会”常二巴摔鬼子

金堂祺

1934年（伪康德2年）在奉天（沈阳市）国民市场（今沈河区团结路二段影院东里）内，建起一座圆顶伞式草亭。草亭内平铺一圆形沙滩，四周围着布圈子，出入口处不时有几个身材高大、头束吊发、身穿和服的日本武士，洋洋自得地晃出晃进。门旁站着头戴巴拿马草帽、身着西装的翻译、扯着破锣般

的嗓子叫喊：“日本相扑比赛大会开始了，买票入场参观。满洲国人（伪满时中国人被称为满洲国人）也可以比赛，输了白输，赢了得奖！”场子外观众熙熙攘攘，但购票观看的人不多。主要原因一是对日本相扑不习惯；二是没有中国人下场比赛也引不起兴趣。

围观的群众，绝大多数是为了看热闹；内中也有少数来自小南岗（今沈阳市第七医院一带地区）、日本站（今南站一带地区）以及小西关（今市府大路回民商店南、北一带地区）的职业或业余的中国式摔跤运动员。这些人早已个个满腔义愤，可是他们的心里都揣着一个“怕”字。首先怕“鬼子”个儿大，难以摔倒；再有“怕”摔倒对方招灾惹祸。正因为这样，两周过去了，比赛场上照旧没有中国人出场。相扑的“鬼子”坐在门外凳子上，双手掐腰，挺着胸脯，眯缝着双眼，环视群众，气焰十分嚣张。翻译扯着嘶哑的嗓子，进行挑衅性的叫嚷：“奖品大大的，哪位敢与日本人比试比试？”

自从相扑大会摆场子那天起，工业区北四马路（今沈河区团结路二段大德里）开烧饼铺的常德清（回族，北京人，人们称他常二巴）的家里，总有那么一群人，其中有冯景福、马明振、安子寿、杨岱蔚等……都是回族的摔跤爱好者，每晚都在谈论相扑大会的情况，一扯就是半夜十一二点。最初只是泛谈日本相扑和中国式摔跤的差异，后来见到“鬼子”盛气凌人的样子，听到翻译挑衅性的宣传，民族仇亡国恨，早已使他们怒火中烧，纷纷表示要下场比试比试。冯景福决心已定，宁肯让“鬼子”摔残废，也要摸摸老虎的屁股。大家争论不休。坐在一旁久未发言的常二巴，站起来对大家说：“我看还是我下场，各位是当地人，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我老伴故去以后，只剩下我们爷儿俩，孩子十好几了。摔了鬼子，惹出事儿来我顶着；如

被人家摔伤了，大家把我抬回家养伤。”大家认为常二巴讲的在理，也就不争了。

消息传出后，一传十，十传百，轰动一时。全市的摔跤运动员，云集国民市场，观众倍增。大家的共同心理是，一要看看看敢和日本人较量的中国人是啥样人？二要看看看胜败如何？场内第一次客满。没买着门票的，有从附近住户借条凳的；也有站在自行车货架上，向里边遥望。几名“鬼子”相互犯嘀咕，翻译里蹦外跳，有些惶恐不安。常二巴按回族的习惯到清真寺沐浴后，众星捧月般地走进场地。只见对面亭子下，三个系着兜裆带、光着身子的“鬼子”挺胸腆肚并排坐着。左边的一号谷月（中国人习惯地叫他大鬼子），中间的二号黑松（二鬼子），右边的三号松下（三鬼子）。常二巴向翻译声明愿与日本人摔跤比赛。他脱去衣服，系好兜裆带，双方站到亭子的沙滩当中。日本人出场的是一号谷月，他身材高大、魁梧，胳膊像两根椽子，大腿好似两根电线杆，站在那里有如半截塔。常二巴中等个儿的小胖子，站在“鬼子”面前，个儿只到人家胸前。在场的观众都为常二巴擦把汗。比赛开始了，两人相对站在沙滩的边缘处，按日本相扑的规矩，哈腰、双拳拄地，一声口笛响，双方刚一站起，谷月想来个下马威，二目圆睁，恶狗扑食般地扑了过来。常二巴矮小，“大鬼子”必须弯下腰去抓，就在这一霎那，只见常二巴身子向左一转，“大鬼子”扑空了，常二巴顺势右手按着“大鬼子”的后脖颈，向右一带，同时下边使个拦门脚，一个“摩脖脚”，把“大鬼子”弄个狗啃屎，噗咚一声摔出圈外。顿时掌声四起。为了进行第二场比赛，翻译急忙向观众摆手、叫喊，想尽办法也阻止不住掌声，掌声持续半个小时。第二场出场的是冯景福对“二鬼子”黑松。黑松在三个鬼子中，他最标致，胸部至小腹都生满黑毛。冯景福虽略高于常二巴，但个头

也只到对方的下巴底下。日本相扑比赛时，下场的人除腰部缠裙布带子、系兜裆外，浑身上下赤条条的，没有抓挠，因此，比赛前双手必须抹些滑石粉为了拿滑。入场后，二人分别站在指定的位置，深哈腰，双拳拄地，笛声一响，双方站起身来将要交手，冯景福笑呵呵地向“二鬼子”点了点头，转身到场外抓些滑石粉，双手搓着，又回到自己的位置。如此反复三次，“二鬼子”以为对方害怕了，他嘴角向下一抿，眯缝着眼睛，晃了一下上身，表现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架势。第四次双方刚一挺起身来，冯景福二目瞪得像一对铜铃，冷不防地冲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一个绊子下去，等“二鬼子”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仰面朝天，直挺挺地躺在场外，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在此以后，马明振、安子寿等人，都前前后后地下场比试过，其中互有输赢。一次偶然的机，杨岱蔚出于有心，但表面上给人以无意的感觉，将“三鬼子”肋骨摔折了两根。不久，“三鬼子”回国养伤，相扑大会随着也销声匿迹了。

（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八辑）

“西窑张”怒惩矾谷川

卢桂珍口述 曹保明 郝家让整理

我们家住在九台城西，老头子张忠禹以开砖窑为业，所以人们都称他“西窑张”。说起来，那是五十多年前的事儿了。康德元年（1934年）的阴历四月二十八，在吉林北山庙会上，张忠禹抱打不平，把一个日本浪人叫矾谷川的给“踢蹬”了。

提起吉林北山的庙会，那是关东有名的。这个从清明开始就有的民间传统庙会十分热闹，一直延续到现在。

那时的庙会，也是个集市交易盛会。每年阴历四月初八、十八、二十八最热闹。为了迎接庙会头半个月北山脚下就搭好了席棚、布棚、马戏棚。卧波桥以北路两侧以及荷花池岸边，一搭眼，全是摊床小店。屋里店外，红红绿绿，什么蜡烛、匣香、铜佛、念珠，以及孩子们的耍物真是应有尽有。叫卖筋饼、凉粉的吆喝声，拉洋片艺人的高嗓门，夹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间响成一片。

阴历四月二十八这天，我家老头子张忠禹不知哪来这么一股劲儿，要去北山逛逛庙会，开开眼界。一早他从九台坐火车去了吉林，上了北山。

北山上，关帝庙前，山门大开，烟雾缭绕。药王庙后门外，一个空场子上，围了一大圈人，原来，一个老道在坐“囚笼”，这是道人化缘的一种方式。老道坐在这个木笼子里，双手合掌、闭目端坐、上身挺直、纹丝不动。木笼子里，老道的头前脑后、身左身右，尖朝里钉满大铁钉，钉尖几乎挨到肉上。更可怕的，有两个钉子尖儿正好对准眼珠子，稍微动弹一点儿，就得扎瞎眼睛。

木笼子旁放一块1米高半米多宽的大木牌，上面糊着白纸写着：“诸君请观，道人坐罐，诚为行善，修桥造福，快来募捐，少给不恼，多赐不烦，功德簿上，美名流传。”下现还有一行字：为修建温德河子桥募捐，落款是：德源道人。

这块募捐牌靠在一张桌子上。桌子前面放个斗形大募捐箱。桌子后面端坐一位年轻的小道士，桌上放一本厚厚的“功德簿”，上面已签了许多人名。

围观的人见道人诚心行善，舍身募捐，深为他的行为所感

动，纷纷掏钱投入募捐箱中。

突然，一阵“八嘎呀路！开路！开路的！”叫骂声传来。大家回头一看，一个日本人大摇大摆地挤进人群。这家伙穿着一件日本和服，腰佩一把银柄短剑，满脸胡茬，满嘴喷着酒气。日本人大多数是小个子，这家伙却是个彪形大汉，看上去很魁实，可偏偏长了一对小得可怜的绿豆眼，贼溜溜地乱转。他醉熏熏地分开众人，挤到前面去看。有人认识这个日本浪人叫矶谷川。这家伙一见端坐在木笼的德源道人十分惊奇，他睁大绿豆眼，张大嘴巴，围着笼子前后转了两圈，指着木牌子上的字问小道士：“这个，什么的干活？”“募捐。”“什么是募捐？”“就是办慈善事儿，要大家捐款，为修温德河子桥。”“募钱，募钱！你他妈的撒谎的有，骗人的干活！”说完窜到木笼后面，使劲将木笼往前一推。只见木笼中道人的脸朝前扑去，“哎呀”一声惨叫，两根钉子刺进德源道人两眼之中，血水顿时从他的眼窝涌出。围观的人一齐惊叫起来。见此惨状小道士赶快跑去扶起木笼子，大声呼叫“师傅，师傅……”泣不成声。可这个日本浪人却哈哈大笑走到募捐箱前，伸手从里面抓出一把票子，狂笑着往空中一扬，正好一阵风吹来，那募捐来的钱，像雪花一样在空中飘开了。围观的人气得个个咬牙切齿，有的直掉眼泪，有的气得发抖。

矶谷川哪管这套，借着酒劲儿，顺手又从募捐箱中抓起一把票子，正要往空中扬去，忽听一声怒吼：“住手！”接着手上“叭叭”挨了两掌。这是我家老头子跳出人群，制止矶谷川肆无忌惮地欺侮中国人。那年他50岁左右，当时气得几根长寿眉都竖了起来。

“你的什么的干活？”矶谷川一见张忠禹土里土气，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趁老头子没注意，便向他猛扑过来，企图来个

下马威。打了几十个回合，不分胜负。老头子对矾谷川的拳脚只是招架，躲躲闪闪，并不想进招。矾谷川打不着老头子，气得他“嗷嗷”乱叫。

这时，小道士与一些好心的游人已经将德源道人抬下山求医抢救去了。矾谷川跟老头子越打越上火儿。围观的人也纷纷高喊“把这个日本鬼子干掉！”“我们中国人不能让他们欺侮！”

矾谷川暴跳如雷，眼珠子都红了，一招使劲过猛，老头子顺水推舟，打他个大趔趄。矾谷川稳了一下脚步，又发疯似地扑了过来，老头子一个“跺脚”只听“叭”的一声，脚后跟跌在矾谷川的脚面上。矾谷川“哎哟”一声，一瘸一拐地退了好几步。这一个“跺脚”就像落下18磅大锤，把矾谷川脚趾骨给踹断了。矾谷川从来也没吃过这个亏。他恼羞成怒，“嗖”的一声，抽出腰间佩带的短剑。说时迟，那时快，矾谷川的剑直奔老爷子心窝刺来。老头子躲过剑锋，灵活巧妙地招架矾谷川的砍杀。矾谷川一看刺不着老头子，气得像条疯狗。起先老头子只想教训教训他，不想，矾谷川没皮没脸接连下毒手。老头子气不打一处来，等矾谷川剑刺过来的一瞬间，冷不防飞起右脚，朝矾谷川拿剑的右手腕踢去。剑被踢到空中，当落下来的一刹那，老头子一个箭步窜上去把剑接在手。他掂了掂手中的剑“嗖”的一声，朝一棵大树掷去，“叭”，正好刺在树干上。

矾谷川狗急跳墙，要和老头子拼命，他声嘶力竭地“嗷嗷”叫着扑过来。这时，老头子怒不可遏，瞅准矾谷川冲过来的机会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照准他眼窝戳去。“噗”的一声，两个指头插进了作恶多端的矾谷川眼窝，这叫“二龙吐须”。老头子知道“踢蹬”日本人惹了大祸。他想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便乘一片混乱之机，混入人群，连夜乘车赶回九台。

（摘自《九台文史资料》）

郑老济痛骂伪警察

李德润

郑海山号老济，义县九道岭镇东羊房村人。伪满时期他家道贫寒，是一个纯朴的庄稼老汉。他终年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破衣裳，他那件破棉袄，耷拉到膝盖下，补丁多颜色杂，大针小线补得一层又一层，好象庙里老和尚穿的百衲衣。他头顶留个小辮子，周围剃了光头，戴一顶多年不换的黑毡帽头儿，脚穿一双牛舔鼻子的布鞋，腰系布带，裤腿扎脚带。一个六十开外的瘦老头打扮得非常古怪，好像济公。他家境虽贫但为人正直，性格坚强，不畏豪强，不贪富贵。

当时东、西羊房、何家沟、冷家沟、靠山屯等五个自然屯算作一个行政屯，屯长是西羊房大财主王日三。他的哥哥王承三在义县开报馆，官府衙门随便出入，没人敢惹。

王家是满满土地庄头；虽然有些衰落，但还占有好地300余亩，可谓独霸一方的有财有势的大户人家。这样，县里每次来官相都落脚、吃住在他家。至于伙食费、招待费当然要出在老百姓身上。上边一来人，每天肉山酒海，大吃大喝，他不但全家跟着吃喝，还少花多报，从中取利。

1943年秋末冬初的一天，伪义县警务科股长徐庆义带着粮谷出荷督励班来到东羊房村。徐庆义身穿警佐官服，全副武装，腰挎洋刀，脚穿长筒皮靴，肩牌上两道黄杠一个梅花。这一伙人到来，可忙坏了肥头大耳的屯长王日三，递烟、倒水大献殷勤。室内欢声笑语，热气腾腾，可是室外站满了欠“出荷”粮

的人群。这些人是被传来受审的，个个衣衫褴褛，瘦弱不堪，在北风刺骨寒气逼人的院子里愁眉苦脸，战战兢兢。郑老济也是其中之一，郑老济两眼盯着屋里的饭桌，怒气填胸，不时在人群中抱几句不平。

郑老济的气话传到了屯长王日三的耳朵里，他平时怕郑老济，惟恐揭他肮脏的老底，而今天便想借着徐股长的威风治一治老头子。酒足饭饱之后，王日三命令大伙回家，在家等着，然后逐户搜查，定数目，定日期。到郑老济家，只见炕上有个瞎老伴，还有一个15岁的儿子，炕上铺着一领带窟窿的破旧毡子和两床破麻花被，唯一珍贵的是门后一个木槽子里装的三斗多高粱米，这是他家的活命粮。王日三看到这里向徐股长使了个眼色，徐就命令手下人把米装上拿走。郑老济看要把米拿走就苦苦哀求说：“秋天没打多少粮食，交了‘出荷’粮又还了点借粮就剩下这几斗了，今冬都不够吃啊！请长官可怜可怜我这老少三口吧！救救命吧！”徐股长喝道：“你这个刁民，硬说没粮，把粮食都藏哪去了！什么救命不救命的，死了你也不少……”郑老济攥着米袋子不放。徐股长看他手不松手就踢他两脚。郑老济火冒三丈开口骂了几句。徐股长听到骂声又看有点不服，遂令手下人将他绑在大树上，扒去上衣用树棍子抽打，打得身上一条红一条肿。乡亲们都很同情，但敢怒而不敢言。郑老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急了，他咬牙切齿，瞪着徐庆义骂道：“你这个丧尽天良的亡国奴脑袋，狼心狗肺，纯粹是有钱人的走狗，穷人的祸害。王日三这个‘二八扣’（王的外号）净说假话，不办人事，谁不知道他种三百多亩地，不交‘出荷’粮，都摊派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你们花天酒地，都是喝老百姓的血。东屯王凤刚（财主）开粉房，给你们送去绿豆汤粉，他种一百多亩棉花，一朵也没‘出荷’，可是别人倒了霉。李老仲家里养羊，给你送去一身羔子皮袄，他仗势欺人，把何家沟的

李老明绑起来用鞭子打了一顿。李玉春送给你一条狐狸围脖，你支持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霸占徐成吉的老婆。宋殿武给你送大烟土，你保着他两口子成年私开大烟馆。李希久给你送大绵羊票子（一百圆一张的伪币）好几张，你允许他放赌抽头……你贪赃枉法，到处搜刮钱财，你是个什么东西！”郑老济喘了喘气又继续骂道：“羊房屯这些坏事，哪一件不都是和你有关系！王久义妻子生小孩子三天，你就强迫她到棉花地拔芝麻，累得她下身子流血，几天后人死了，这条人命就丧在你的手里。你仗着当警察官，就这样欺压黎民百姓！我今天豁出来这条老命啦！不死的人都会看到你的下场！”郑老济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在场的人无不怜其衰老、贫困，暗暗赞其坚强不屈。后经屯中父老为老汉苦苦求情，徐庆义也怕打死人不好收场，才借台阶放了郑海山。

郑老济被松绑放回家后还是大喊大骂。

（摘自《义县文史资料》第四辑）

伪警察署变成“膏药铺”

张绍华 刘宝成 整理

在日伪统治时期，蛟河铁路工人，曾采取过一些巧妙的办法，向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进行了自发的斗争，搞得日本侵略者无可奈何，狼狈不堪。蛟河镇内有一个伪警察署，署里除少数日本人还有一些甘心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和走狗的中国人，这些伪警察们依附日本人的势力，在镇内横行霸道，耀武扬威，打骂群众，为非作歹，广大群众对他们无不恨之入骨。蛟河火车站调车组的青年工人们，为了给老百姓出气，打击伪警

察们的嚣张气焰，他们几个人凑在一起，研究了一个巧妙的惩治办法。

1943年6月的一天深夜11点多钟，镇里的商店，摊床都早已闭店和收摊了，居民们进入了梦乡，街上空无行人，四处静悄悄的。突然，暗处闪出了三个人影，是谁？他们三更半夜去干什么？原来这是车站值夜班的调车组青年工人刘海洲、吴殿君和丁殿臣。只见他们悄悄地来到了距伪警察署一百多米远的膏药铺前，将药铺的膏药幌子（用一串方型板连起来的，中间画有一个大黑点）摘了下来，迅速地拿到了伪警察署的门前，吴殿君、丁殿臣两人一左一右负责了望，刘海洲把伪警察署的牌子摘了下来，随后，又将膏药幌子挂了上去，紧接着他们又把警察署的牌子扛到了膏药铺。

第二天一大早，街上的群众发现警察署的牌子不见了，却挂上了一串黑、白、红三色分明的膏药幌子。不一会，警察署门前就聚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有的说：“警察署搬家了，你看牌子都换了。”有的说：“警察署挂着膏药牌子，这可真是挂羊头卖狗肉了。”哈哈……

群众的围观和笑闹，惊动了署里的警察。开始他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一个个气势汹汹地从屋里冲了出来，正要驱散围观的群众时，才发现牌子被人换成了膏药幌子。警察们不知所措，狼狈不堪，他们气急败坏，立即四处查找，最后发现牌子挂在膏药铺门前。他们把牌子拿回来，立即派人在全镇进行查询，查来寻去，也没找到线索。这次哄动全镇的笑柄事件，也就不了了之。

（摘自《蛟河文史资料》）